



杨鲁军 著

# CONGSHU

论里根经济学

青年学者丛书

青年学者丛书

# 论里根经济学



学林出版社·杨鲁军著

责任编辑：陈 听

封面设计：沈蓉男

## 论里根经济学

杨鲁军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插页 4 字数 27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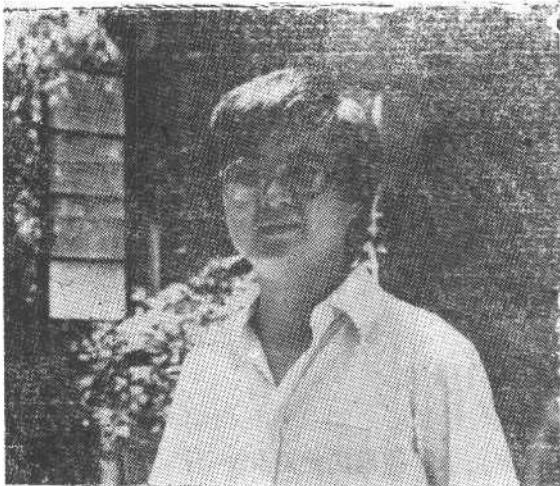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

书 号 4259·042  
ISBN 7-80510-066-7/F·6

定价 3.20 元

作者近照  
冯学敏摄  
1987年7  
月



## 作者简介

杨鲁军，1961年生于上海，1979年考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1983年、1986年先后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副主编、上海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自1980年起，杨鲁军在《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文汇》、《社会科学战线》等报刊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近百篇，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学术见解，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重视。他主持编撰了《世界经济论文篇目分类索引》，并译有《合理预期》、《供给学派革命》等书。本书系杨鲁军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 出版前言

CHUBAN  
QIANYAN

有位未来学者声称，今天社会的显著变化之一是：人类社会已从“年轻人向长者学习”的“后喻”文化，转变为“成年人和儿童主要都向同代人学习”的“同喻”文化；下一阶段将是“长者向年轻人学习”的“前喻”文化。

事实上，年轻人与年长者之间总是互相学习的。如果把这位未来学者的说法绝对化，不免失之偏颇；但他指出年轻人越来越走在前头的趋势，则是很有见地的。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理论界就有一股颇为引人瞩目的“前喻”文化潮流。一批青年学者奋然崛起，以犀利的锐气、独到的见识和严谨的学风，向我们展现了不少令人振奋的新的研究成果。这决不是偶然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形势为这批新人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壤。

当前，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观念形态，同时推动着人类知识系统的高度互渗，新领域、新学科、新课题不断地被开拓。面对这新情况，年长

者和青年人必然地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由于青年人拥有思维结构灵活的优势，因此可能思想更解放，更勇于探索，他们的研究也就可能更富有生命力，更富于创造性。

面对学术理论界新人辈出的形势，出版工作者有责任把他们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这对于我国学术的繁荣和新人的成长都将是十分有益的。为此，我社决定出版“青年学者丛书”。

出版“青年学者丛书”是个新的尝试。我们渴望这套丛书能获得青年学者们的支持，向我们出示你们的最新、最佳的研究成果。同时，我们也期待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给予热忱的关怀和帮助。毫无疑问，任何新的成果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获得的；任何一个青年学者的成长都有赖于前辈的扶持。

我和青年学者一起瞻望着中国学术的未来。

学林出版社

序  
—  
XU

(一)

记得美国经济学家雅克布·维纳(Jacob Viner)说过，“经济学是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迄今为止，在经济学的大厦中，哪里有过非经济学家的地位？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领地，就象物理学是物理学家的领地、数学是数学家的领地一样简单和无庸置疑。在科学，包括人文科学的王国中，不同的学科就是不同的领地，在不同的领地中自然都有自己的领主、自己的规则。谁能动摇这种秩序呢？

自从里根经济学产生之后，经济学家的领地受到最为严重的挑战。里根当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他没有在美国一流大学获得过任何经济学的学位，也没有出版过任何经济学专著。里根是美国第49届和第50届总统，是政府的首脑，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经济学，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承认，以至于一切没有偏见的经济学家都要严肃地探索里根经济学所蕴含的理论内容，评价里根经济学的政策效应。毫无疑问，杨鲁军所著的《论里根经济学》在这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他认识到了：“美国已经与里根联系在一起，里根已经

与里根经济学联系在一起。没有里根的里根经济学是不存在的，正如不存在没有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记》一样。”他还预见到了：“当我们的后人在若干年以后重新回首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经济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会严肃、公正而冷静地总结和确定里根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发展长梯上应有的位置和等级的。”

客观地评价里根经济学，不仅要摆脱作为经济学家的偏见，还要摆脱对美国经济历史传统认识的偏见，摆脱对影响并构成里根经济学的各种经济思潮的偏见，摆脱对里根个人的偏见。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还需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教条主义的偏见。在所有这些方面，鲁军的努力都是显而易见的。智慧，从来在于避免偏见。我们看到了一种没有经济学家偏见的智慧，一种无视教条主义束缚的智慧。

有了这样的智慧，才可能走向智者。

## (二)

把里根经济学归结为供给学派的理论，恐怕是对里根经济学最大的误解，而把供给学派的理论说成是萨伊定律的复活，使得对里根经济学的认识从误解走向荒谬。鲁军在他的《论

里根经济学》中成功地论证了里根经济学是一个体系，供给学派的理论，只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而且供给学派并不是萨伊定律的复活。

鲁军说：“里根经济学，委实是对里根的经济哲学思想、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及其实施进程的最好概括，正如‘新政’是对罗斯福的经济政策的最好概括一样。”如果特别剖析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既可以看到供给学派的主张，又可以看到货币学派的主张，甚至还可以发现凯恩斯主义的某些主张——至少可以肯定，凯恩斯主义在 80 年代的美国并没有被完全丢弃。里根博采众长，不拘一格；他的经济学包含了每一家经济理论的合理或可取之处，而在整体上又不同于任何一家经济理论。”这就是说，里根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综合性，而综合就是创造，创造就意味着生命力。

要理解里根经济学的构成，首先要认识里根经济学所要解决的现实经济难题。简单地说，里根经济学所要解决的现实经济难题是“滞胀”，这是 70 年代以后的数届美国政府都未能摆脱的难题。

供给学派理论的价值在于重新恢复了供给的尊严，或者说恢复了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尊严。自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发表以

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官方制订经济战略与政策的基本依据。在这个意义上说，从战后到 70 年代前后是“凯恩斯时代”的说法，绝不是一种虚构。凯恩斯学派认为凯恩斯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根据有效需求理论，供给因素是被假定为已知的，全部分析主要集中在需求方面，即：集中地探索有效需求所以不足的各种因素和原因，构成其就业理论体系；制订弥补需求不足的各种措施，构成其需求管理方案。70 年代以后，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供给方面绝不是可以忽略的。如果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供给不足，经济增长停滞或过于缓慢，那么，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无论如何是一种选择。供给学派要求人们把视线转移到供给方面，去追求经济增长，并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构想，从而导致了凯恩斯时代的终结。

里根经济学要解决美国曾经严重存在的经济增长缓慢的问题，以求增加供给，所以把供给学派的理论作为其组成部分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关于这点，鲁军作了这样的概括：“所谓以供给学派政策对付经济停滞，即是从凯恩斯学

派所主张的刺激需求转为增加供给；从原来主张政府干预、推行赤字财政、不断提高税率、鼓励消费乃至浪费而导致个人储蓄和私人企业投资锐减，转为减少政府干预、大幅度削减税率、鼓励个人储蓄和私人企业投资以刺激生产。”“可以认为，这是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转换点。”

然而，供给学派并非是萨伊定律的复活。鲁军从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第一，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创造需求，总供给和总需求一定相等。而供给学派则认为，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滞胀”经济的症结在于供给不足，总供给和总需求大有轩轾。第二，萨伊定律认为在竞争环境下，供求会自动达到均衡，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供给学派则认为，在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中，供给并不能自动达到均衡，政府通过一系列干预措施来刺激供给，以使供求趋于均衡是完全必要的。第三，萨伊定律反对国家干预，反对任何性质、任何方式的干预，而供给学派并不绝对排斥国家干预，他们所主张的通过减税刺激供给本身就是一种国家干预，只是要把国家干预的程度和范围缩小到最低和最适度。

在如何对待通货膨胀问题上，里根经济学所接受的却是货币学派的主张。在货币学派看

来，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正如弗里德曼指出的：当货币量的增长速度超过生产的增长时，通货膨胀就发生了。货币量增长得越快，通货膨胀率越高。只有关闭了货币水龙头，才可以使浴室中充盈的通货膨胀得到制止。在这本书的第八章，作者详尽地论证了里根的货币政策，而“里根的货币政策在里根经济学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章中，鲁军没有去简单地说明里根货币政策与货币学派的相互联系，而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讨：第一，由于货币政策传递过程的复杂性和漫长性，对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研究，是研究包括里根货币政策在内的任一货币政策的关键所在；第二，不同中间目标的适用条件取决于究竟是维持利率稳定而听任货币供给量波动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还是控制货币供给量而听任利率波动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而这是以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矛盾状况作为前提的；第三，在国民经济表现为“需求不足”时，以利息率作为中间目标，而在国民经济处于供给不足时，则以货币供给量作为中间目标；第四，里根的货币政策完成了从钉住利息率向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转变；第五，货币供给量中间目标的确立，标志着货币主义已经正式付诸于实

施。我相信，如果弗里德曼读了这些论述，也会认为鲁军是他在太平洋彼岸少有的知音。

事实表明，货币供给量中间目标的实践是成功的，曾经困扰美国经济达十数年之久的“滞胀”基本被打破了。只是，鲁军没有忘记提醒人们：里根货币政策得以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联邦储备银行根据 7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形势的变化，选择了正确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并坚持不懈地执行下去”；自 70 年代末，即里根上任以前开始的美国货币银行体制的变革，为里根货币政策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相比而言，供给学派反通货膨胀的构想则是幼稚的和不现实的。因为，他们主张通过重建金本位制来实现物价的稳定，而这种主张显然是一种倒退。30 年代大危机期间和以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放弃了各种金本位制，实行纸币制度，这是金融深化最为重要的标志，是不可逆的。恢复金本位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里根货币政策完全摒弃供给学派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

### (三)

要抑制通货膨胀，只要采取减少货币供应

量的对策，必然引起利率的上升。而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高利息率势必抑制投资积极性，阻碍经济增长。这就是说，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似乎是不可能兼得的。在里根执政的初期，经济状况也正是这样：在高利率的打击下，许多企业无力借贷，因而破产企业急剧增加；1982年，企业破产率创战后的最高纪录，由于大批企业破产，失业人数增加。在高利率下，工商业投资也曾显著下降。但是，从1983年到1986年，经济状况发生了非寻常的变化，在高利率之下，发生了高投资率和高增长率，换句话说，高利率与高投资率、高增长率并存。仅此问题，不知使多少经济学家陷入困惑之中，很多人无法摆脱传统经济理论的窠臼，而得出了无法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判断。鲁军早在1985年初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就已经意识到：高利率政策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到了一种新的均衡点和支撑点。在《论里根经济学》中，鲁军关于高利率与高投资率和高增长率相互关系的认识，业已臻于完备。

根据鲁军的看法，高利率之所以未能阻碍乃至窒息投资，至少有六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成功有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第二，高投资不能不源于政府的扶植；第

三，巨额外资的流入是高利率与高投资得以并行不悖的重要支柱；第四，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构成及其筹资形式的变化，也有助于减缓和化解高利率对企业投资的不利作用；第五，维持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关死工资无限上涨的闸门，使企业利润有显著提高，以保持良好的投资预期；第六，近年来出现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企业兼并狂潮，也为投资的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里根政府扩大军费开支的政策，80年代以来世界石油价格的下跌，也对投资产生了刺激作用。

在上述诸原因中，第三个原因和第六个原因尤其值得关注。

巨额外资流入美国，首先归结于美国的高利率、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利率差的扩大；同时，美元汇率的提高也对外国资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近年来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速，使资本的国际流动更少考虑国界的限制；加之美国有较好的投资环境和资本收益，也导致各国对美国输入资本。巨额外资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内资金的不足。对此，鲁军写道：“里根经济学的棋高一着之处，就在于善于大胆利用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不足，既不破坏国内紧缩的货币政策，又不致于使投资的资金供应濒于枯竭——具体地说，即在高利率使政

府在资金市场上‘挤占’私人信贷的情况下，假于外资来补充国内资金的不足。这既有助于部分地弥补财政赤字……，又有助于满足经济复苏后的旺盛的投资需求——从而基本化解了所谓‘挤占效应’。”上述结论，是极有见地的。

战后，美国的产业结构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周期获得了调整。但是，大多数调整都是局部性的。到了70年代以后，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高技术产业的绝对优势在迅速丧失，传统产业和整个制造业的技术基础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造。伴随着里根经济学的实施，高利率的冲击，无疑强化了产业结构的改组与调整。道理十分简单，在高利率之下，只有能够获得更高利润率的高技术产业，才可能生存和发展，只有创造具有高的劳动生产率的企业，才可能避免被兼并。近年来不少资料已表明，里根执政以来，美国的产业调整与改组是卓有成效的。

出色的经济学家的本领在于把复杂的经济现象，最终归结为最简单的经济原理，而使人们接受。鲁军对高利率与高投资关系所作的结论，就做到了这一点，他说：“显然，在持续高利率下仍能赚取高于利息率的利润率，这是高利率与高投资相伴存的最基本的前提”。

## (四)

如果说，鲁军在论证高利率和高投资率并存时，显示了他的学术功力，那么，他在论证高利率与高债务、高汇率的关系时，则给读者以启发和思考的余地。

在分析美国的巨额国债时，鲁军介绍了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艾斯纳(Robert Ersner)教授和芝加哥伊利诺大学的助理教授保罗·J·皮珀(P. J. Pieper)近年来从全新的角度探讨美国国债问题的思路和结论。他们认为，过去所有计算国债和预算赤字的方法是错误的，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务帐册与一般工商企业不一样，它不计入联邦政府的资产，也不区分资本预算和本期预算。按照他们计算的结果，近30多年来，美国国债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从而说明了为什么巨额国债至今尚未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危害。鲁军没有直接讨论艾斯纳和皮珀的理论与方法，但是，却肯定了“这是一条更接近于实际情况的研究美国国债问题的有益的思路”。这里隐含着作者的看法，长期以来，美国国债是被高估的。应该说，在国内外，正视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为数不多。